

韩国公州宋山里 6 号坟铭文砖释读管窥

〔韩〕赵胤宰

(韩国仁济大学历史考古学系 韩国釜山)

内容提要:韩国公州宋山里 6 号坟出土的一方铭文砖上刻有一段关于百济与中国南朝萧梁间交流的记录,现有释读存在对铭文字体及内容过度附会的情况。根据书体的比较和相关文献的检读,砖铭应为“梁宣以为师矣”,并可据此推断出墓葬筑造负责人的国籍及社会地位。

关键词:宋山里 6 号坟 铭文 释读

中图分类号:K867.9 文献标识码:A

一 序论

如所周知,百济宋山里6号坟封门墙中发现的一块楔形砖的侧面刻划有一行铭文,过去一般释读为“梁官瓦为师矣”(图一)。作为文字材料,由此可以推测百济砖室墓筑造的渊源及系统,其重要性自然无须再言,但对铭文的释读直到现在仍有众多分歧。最近,金泰植先生在《从宋山里6号坟铭文砖的再检读再论武宁王陵的筑造》一文中,对现有研究者的判读及解释进行了辨讹,认为“瓦”并非文字(表一)<sup>[1]</sup>。笔者最近有机会在公州博物馆内亲眼目睹该铭文砖,也对第三个字“瓦”心生疑问。实物或拓本没有任何确证可以将此字判为“瓦”。当然,要提供不是“瓦”字的理由也非易事。但综合考虑,能将此字判读为“瓦”的可能性极小。对于学者们意见相对较为一致的“官”字,笔者认为也有必要重新推敲。本文通过中国文献记载中的铭文语法、书体及出土遗物上

所存铭文的一般情况,对“梁官瓦为师矣”的释读及几点疑问再做一些探讨。此外,对于金泰植先生提出的铭文中的第三个字不是文字的论点也一同进行讨论。

二 通过相关中国材料对判读的再检讨

1.通过古代汉籍记载的语法进行的探讨

中国自先秦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留下了大量的诸子百家、正史、个人文集、碑帖、志石、金文等文献记载,其中与百济国家形成及发展阶段相当的是汉晋六朝时代。通过参考汉晋六朝时代相关文献记载中的语法,并且选择典籍版本无太大争议的正史及出土志石作为依据,对宋山里6号坟的墓砖铭文的行文进行比较分析,应该说是比较妥当的。

这一时期史籍记载中关于人物的记录占据了绝大部分,在严守身份及阶层的封建社会中,对人物的记录不仅极为慎重,带有极大正确性,而且作

表一// 宋山里 6 号坟铭文砖的现有释读

作 者	铭文判读	铭文解释	出处
轻部慈恩 <sup>[2]</sup>	梁官品为师矣 梁官瓦为师矣	以梁朝官营物品为典范 以梁朝官衙的瓦为典范	《百济美术》,1946 年 《百济遗迹的研究》,1971 年
关野贞 <sup>[3]</sup>	梁?? 为师矣	将梁朝匠人?? 奉为老师	《朝鲜的建筑与艺术》,1941 年
郑在勲 <sup>[4]</sup>	梁良瓦为师矣	将梁朝优质的瓦奉为标本 将梁朝优秀的瓦匠奉为工师	《文化财》第 20 号,1987 年
金泰植 <sup>[5]</sup>	梁官为师矣 <sup>[6]</sup>	将梁朝的官吏奉为老师	《忠北史学》第 19 辑,2007 年

收稿日期 2010-07-02

作者简介 赵胤宰(1968~),男,韩国仁济大学历史考古学系助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汉唐考古及韩国历史考古。



图一// 宋山里 6 号坟出土铭文砖

为一定的记载原则被严格遵守。为墓主留下的志石铭文也同样谨守此原则,首先记录年号、职官、祖籍、姓、名、字等,然后再叙述此人的行事及其生平,这是一般惯例<sup>[7]</sup>,即在职官之后必定是人物的姓氏或名字。实际上,在汉籍的记载中,这种样式也不难发现。铭文“梁官瓦为师矣”中,出现“梁”这个中国南朝朝代的名称确属特别,以记录梁朝的人在异国所行之事实。记录国籍之后就写下身份,这是顺序;在记载具体身份有困难的情况下则会直接记下姓名。因此,先不管对“官”字的判读有无问题,铭文在身份或姓名的记载形式上并无大的出入。但若对“梁官瓦为师矣”中第三个字依照从前判读为“瓦”的话,铭文的大致含义就变为“将中国梁朝官营工房的瓦片视为榜样”。这与古汉语语法的一般情况对比,不仅文义全然不顺,不合语法的部分也很多。将“官瓦”看为官营工房之瓦没太大问题,但若这样释读的话,以瓦片“为师”(被“视

为榜样”)则多少有些附会牵强。一般而言,古汉语中“师”通常解释为将帅、老师、中下级工场官吏、监督者<sup>[8]</sup>,很难看到“将某物视为榜样”的用法及意思。因此若将第三个字隶定为“瓦”,则整个句子的意思都被歪曲了。

2.通过中国古代器物制造职官进行的探讨

“师”作为职官名,常见于战国秦汉时期(表二)。当时生产武器、漆器、铜器等时,作为负责人的中级官吏,具体负责器物的制造。表二中所列出的负责器物制造事务的主要职官名多被称为“工师”,这些职官业已得到确认<sup>[9]</sup>。这样看来,将“师”解释为“榜样”抑或“标本”,是由铭文第三个字“瓦”的解释而来,与中国的工官体系不符,故有意译过度的嫌疑。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有对各种器物分门别类地写下铭文的制度及习惯,特别是金属器物、漆器、墓砖、志石等均记录有铭文。其中秦汉时期铁器的生产过程及生产体系相对而言较为完备,铁器的铭文中详细记录了产地、负责指导的职官、器种等。如秦代统筹指挥的“主要负责人”的职称被记录为“工师”,到了汉代不再使用“工师”,而在工师之外出现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多种职名,但它们均可认为是包括在“工师”的范畴之内。汉武帝之后中央政府在漆器的主要生产地设立了“工官”,“少府”则对全国各地的“工官”进行管理、监督<sup>[10]</sup>。这是对之前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郡县直辖系统进行改革后,将带有浓厚官府经营性质的管理系统转变为中央集权体系的结果,因此才会出现先前漆器铭文中未曾见到的记载方式。如贵州清镇汉墓中出土的漆耳杯上的铭文为“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月画木黄耳杯”,各制造过程中负责的工匠一一记录在案<sup>[11]</sup>。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绝大部分汉代典章制度,因此官府手工业的职官及管理也大致遵循汉制。这一时期的铭文砖中作为制造者职称“师”的

表二// 战国秦汉器物制造职官名<sup>[13]</sup>

生产方 国名		<制造者> 制造事务者	<主者> 制造负责人	<省者> 制造监督者
三晋	韩	冶	工师、冶尹	令、司寇
	赵	冶	工师、冶尹、左右校	相邦、守相、大攻尹(中央)、令
	魏	冶	工师	邦司寇(中央)、令
秦		工	工师、丞、士上造、工大人	相邦(中央及内史)、守(地方)
汉	铜器	工	护、左、啬夫、掾(令史、史)	令(长)、升(尉)、护工卒史、监掾
	弩机	郭工	令、丞、掾、史	监工掾、护工掾、护工令、护工卒史

表三// 宋山里6号坟砖铭文与中国历代草字体比较

宋山 銘文	宋山里6號墳磚 銘文 宋山	中國歷代草字類別			
梁					
官(?)					
宣					
瓦(?)					
以					
爲					
師					

铭文已被确认<sup>[12]</sup>,只是相关时期有所关联的典籍记录中未曾见“师”之职名,其具体品级及所属并不分明。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砖的制造渠道变得多样起来,民间砖窑活跃后,习惯性地对制造者冠以“师”之称谓。考虑到这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及建康地区写有“师”之称谓的器物,可理解为是对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的证据。

### 三 通过字体比较对“官”、“瓦”判读的疑问

对宋山里6号坟砖铭中第二个字“官”的判读,虽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肯定,但对照同时期中国的笔法及字体,笔者认为将其释定为“官”仍存在一定问题。细看中国历代法帖的材料,笔者注意到,铭文砖的文字与“官”字多少存在着差异,反而更接近于“宣”字的笔画。宋山里6号坟砖铭本身接近于章草书体,这是流行于东汉、六朝时期的书体(表三)<sup>[14]</sup>。我们发现自三国时期至隋朝,“官”字的行笔方式及构造并无大的变化。宋山里6号坟铭文砖上的“官”字笔画形态比起中国汉晋法帖中的“官”字,反倒更像中国历代草书中的“宣”字。若将铭文中第二字看为“官”的话,则完全迥异于中国字体的笔画构造。若判读为“宣”的话,则其为人名

的可能性较高,且不违背典籍古汉语记载的基本规则。然则将铭文中的“师”,看作具备管理、监督筑造宋山里6号坟的“冢师”性质的人物的话,则会相对自然些<sup>[15]</sup>,即铭文可释为“梁人宣作为冢师,监制坟墓之筑造”;而铭文中的“瓦”字则与中国历代草字“瓦”字的笔画构造截然不同,反倒更接近于“以”字。在轻部慈恩先生早期拓本的真实性还未得到确证的前提下,似无理由将“以”判读为“瓦”。此外,金泰植先生认为“瓦”也许不是文字,而是书写过程中衍生出的错笔,这样的观点也有再斟酌的必要<sup>[16]</sup>。古汉语纵向书写的行文方式,一般都会保持字与字之间的间隔,那么不将“瓦”视为文字的理由,即认为这个空隙是因其它五个字的笔画距离不规则所致,要找出这样的例子实属不易。

### 四 关于坟墓筑造者“宣”的几点探讨

铭文中坟墓的筑造者“宣”的国籍问题不会有太大争议,但实际上当时“宣”的政治社会立场及地位,仅凭此铭文的内容还难以解开。假定“师”的地位是建筑坟墓的总监督的话,那么“宣”是否就是汉籍记载中的“冢师”、“材官”<sup>[18]</sup>,还是某种程度上与墓工等专门葬师相似的角色?在汉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材料中,能够找出与坟墓筑造、丧事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职官。

《太平御览》卷四七《地部》一二“洛思山”条引孔晔《会稽记》:

永兴县东五十里有洛思山,汉太尉朱伟为光禄大夫,时遭母哀,欲卜墓此山,将洛下冢师归,登山相地,冢师去乡既远,归思常深忽极,目千里北望京洛,萦咽而死葬山顶,故以为名。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

……可追赠太尉,侍中、中书监、公如故,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葬礼依故太宰文简公褚渊故事,冢材官营办,谥文献公。

《南齐书》卷二〇《高昭刘皇后传》:

年十余岁,归太祖,严正有礼法,家庭肃然。宋泰豫元年,年五十,归葬宣帝墓侧,今泰安陵也。门生王清与墓工始下锄,有白兔跳起,寻之不得,及坟成,兔还栖其上。

《南史》卷三八《元景弟子世隆传》:

世隆晓数术,于倪塘创墓,与宾客践履,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墓工圆墓,正取其坐处焉。

此外,晋代“山陵使”的职责也是全权负责皇



室的丧事<sup>[19]</sup>。这些专门筑造坟墓的工匠们参与陵墓的营造,为构成当时中国社会中墓葬营造规范化及制度化创造了条件<sup>[20]</sup>。“宣”的社会地位大概也是筑造坟墓的专门工匠,这种可能性很大。但在梁朝国名之后一般会书写的年号却未被记载,“宣”的身份本身也有可能是在年号书写上受到制约。若非如此,也不能排除铭文记载者全然不具备社会制度的知识及素养之可能性。但若铭文记载者为百济人,其社会制度方面的素养及个体性格也有必要进行分析。因为从百济人的立场来看,仅记载坟墓建造者的国籍也不为怪,而且在“一定要使用中国年号”尚未制度化或一般化之时,参照当时百济的情况来看,记载年号反倒会显得不协调。那么,书写者为学习过汉字的百济朝廷官吏的可能性将更大。

将“师”的内涵再缩小一点,即从墓砖制造者的官职级别来分析解释也行得通。如上所述,不仅是墓砖,其它器物中所出现的铭文也呈现一定的固定形式,开头会记载朝代名或年号。汉武帝以后有关年号的制定及使用渐渐普遍起来,初期年号的使用极为严格。西汉初期惟有天子才可使用年号,连诸侯王皆被禁止使用年号<sup>[21]</sup>。但此后年号的使用逐渐普及,纪年遗物也更多考古发现。六朝时期的墓砖铭文大抵分为纯纪年文、建墓纪年文、墓主纪年文等。这些纪年文都具体记载了实际年代,通过这些可以了解墓葬建造时间、墓主死亡时间及生平等,可谓是一种重要的“埋葬史料”。如曾为南朝都城的南京市栖霞区梁桂阳王萧融夫妇墓中<sup>[22]</sup>出土了“张承世师”砖文,同一时期的中原洛阳汉魏古城遗迹中也发现有“师赵黑”及“师高春”一类瓦文(图二)<sup>[23]</sup>。南京出土的“张承世师”砖文,“张承世”为人名,后面冠以的“师”字可判定为制造砖的匠师的官职级别<sup>[24]</sup>。洛阳发现的“师赵黑”、“师高春”瓦文,仅仅是记载顺序有所颠倒,推测这是与瓦的制造者有关的官职。由此可见,尽管“师”不属于正式编制的官职,但至少也是民间手工业者们所使用的对外职称,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要将“师高春”瓦文上的“师”字作为上述“冢师”来理解多少有些牵强。遗物出土于称为汉魏古城遗址的都城遗迹之内,作为用于地面构造物的陶瓦,其类型虽与墓砖有所区别,但将“师”视为器物制造的最后负责人则无大碍。

南朝时期出土墓砖的铭文的制作方法一般以模印法为主。这些文字砖的字体大部分采用楷书及隶书,间或为楷隶过渡期的字体,这是因为通过模印能够表现出理想字体的缘故。但也出土了一



图二// “张承世师”砖文(左),“师高春”及“师赵黑”瓦文(右)

部分以阴刻手法刻划的草书体砖文,这便告诉我们草书刻铭最晚也是六朝时期墓砖铭文制作中所使用的一种书体<sup>[25]</sup>。阴刻的草书刻铭要比模印法容易,因此其工本也有减少。

当时百济的书法体系情况,现在还很难具体了解,但百济的知识阶层们关于中国文化的素养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sup>[26]</sup>。此外,无法排除汉籍与中国书法已输入百济,并使用其来处理文书行政及职官系统的可能性<sup>[27]</sup>。特别是将这种文字体系以政治社会的模式来运营,对当时百济的支配阶层或知识阶层们来说是极具魅力的一件事情。这是中国古代书体发展过程中相对而言具有鲜明时代性及地域性的文化共享现象之一。“北碑南帖”最为贴切地反映了当时南北中国的书法形态。特别在法帖发达的江南地区,草书最终大行于天下。因此,当时与百济维持着密切交流关系的南朝政权的书法体系为百济知识阶层所吸收的可能性不言而喻。换言之,确实会有学到这种“舶来品”书体的百济书法家的存在。宋山里6号坟的砖铭忠实地效仿了当时南朝流行的章草或是向今草过渡阶段的书体,当然要判定铭文的书写者是成功地学到了南朝书体的书法家还有些依据不足,但至少可以肯定是对书体有长期了解并将其体系化之人。那么,对于砖铭书写者的身份或其政治社会地位,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当时东亚汉字使用圈中,知识阶层的形成是让5~6世纪的百济吸收汉字并用于社会性活动的动因。但关于国事的文字记录、记载等文案公事,应该不会从中国调用人员或将此事委任给外国人,也就是说由百济人来书写铭文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各朝代的书体及书法是经历了一定的发展体系后而形成的<sup>[28]</sup>。韩国早期的三国时代,因与中国频频进行文化交流,汉字文化得以使用并成型。从文字习用这一层面上来看,书法潮流是我们该关注的重要部分。接受汉字时间相对较早的高句丽,留下了不少碑文及文学作品<sup>[29]</sup>。据考察,这当中广开土王碑及中原高句丽碑等,是受到了当时中国

中原地区或中原外沿边疆地区镌刻样式的影响<sup>[30]</sup>。但高句丽碑文的书体与汉文圈书体类型的模式不同,由始至终都是古拙刚正的书风,看不到风靡东晋南朝的草书及行书的使用,也就是说其在接受中国书法上多少有些迟滞。但百济异于高句丽,我们可见其在书法文化吸收上的与时俱进。正如宋山里6号坟所见到的,我们确认了部分百济吸收当时南朝社会中盛行书体之一的章草,这可以说是国家间对汉字及书法吸收的差异性。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是因为百济对中国的交流是出于其外交、政治性立场,而高句丽则是出于其它目的。尤需关注的是,东晋南朝时期,百济与南中国的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与萧梁的交流要远比与前朝的交流频繁。不仅如此,百济还积极引进梁朝的上层文化<sup>[31]</sup>。这一时期,以建康为中心的中国南方书法大家辈出,而且他们的书风也以法帖的形态体现出来<sup>[32]</sup>。与墓碑或墓志不同的是,法帖更多地涵盖了笔法的多样性及艺术性,且书写完后将自己的真迹随即赠予别人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这也许是南朝书法能在百济文化中更易被吸收的原因。

## 五 余论

上文所揭示的与中国相关的草书字体,在谱系上与宋山里6号坟铭文砖的文字及书体极为接近。只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草字对象个数有限,这与想大范围地进行书体比较后再做判读的初衷多少有些出入。但幸好能将具有争议的几个文字作为比较对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有效地揭示了论题。

本文根据书体比较及相关文献的检读,将宋山里6号坟出土的砖铭释读为“梁宣以为师矣”,并进一步解释为“梁人宣作为冢师监制坟墓的筑造”。凭此可以推断墓葬筑造负责人的国籍及社会地位,也可与中大通六年(534年)、大同七年(541年)梁与百济之间的人员交流情况<sup>[33]</sup>相联系。

总之,现有的释读存在着对铭文字体及内容过度附会的情况,可以认为这是对宋山里6号坟砖铭进行客观综合研究的一种妨碍。特别是轻部慈恩先生的释读形式<sup>[34]</sup>,无视最基本的书体分析方法,成为日后研究的一种固定模式,引发了很多无谓的争论。而关野贞先生对最有争议的“官”、“瓦”未作释读,这一见解相对而言虽较为妥当,但对于止息日后诸家争论仍有不足。笔者的探讨基本上将重点放在砖铭个别文字的解读上,对铭文内容背后的历史背景及脉络的考察及研究还不够成熟,实为管窥之见。但因铭文的判读是当务之急,

容日后再对此论点做进一步推敲。

(本文译稿承南京市博物馆王志高先生校对,谨此致谢。)

[1][5][16][韩]金泰植:《从宋山里6号坟铭文砖的再检读再论武宁王陵的筑造》,《忠北史学》2007年第19辑。

[2][日]轻部慈恩:《百济美术》,宝云舍昭和十六年(1946年);轻部慈恩:《百济遗迹的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四十六年(1971年)。

[3][日]关野贞:《朝鲜的建筑与艺术》,岩波书店1941年。

[4][韩]郑在勋:《关于公州宋山里6号坟》,《文化财》1987年第20号。

[6]金泰植认为第三个字不是文字,大概是因为与其它文字相比,此字笔画太少且不够清晰,相对而言不易判读。但查看同时期中国章草书体的话,此字与“以”字极为相似。

[7]皇帝或王侯级人物则要避讳。

[8]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2年。

[9]黄盛璋:《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1958年第8期。

[10]高崇文、赵化成:《秦汉时期漆器的发现与研究》,《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11]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霸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12]黄土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的瓦》,《考古》1962年第9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桂阳王萧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第12期。

[13]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化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第138页。

[14]王靖宪:《魏晋时期的章草书》,《中国书法艺术·魏晋南北朝》,文物出版社1998年。

[15]关于古坟筑造者,已有中国人制造说或由中国南朝提供技术指导而筑造的见解,参见齐东方:《百济武宁王陵墓与南朝梁墓》,《武宁王陵与东亚文化》,《纪念武宁王陵发掘三十周年论文集》2001年;冈内三真:《百济武宁王陵与南朝墓的比较研究》,《百济研究》1990年第11辑。

[17]表中的毛笔书体摘自《草字编》(洪钧陶著,文物出版社1984年)、《草韵汇编》、《章草字典》(黄堂生著,荣宝斋出版社2006年),个别记载于书法家法帖。

[18]南朝时期,材官是负责土木工程的相关职官,偶尔与营造陵园相关,但营造陵园非其主业。

[19]《宋书》卷一五《礼志五》:“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从上述内容可见,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之前就已有山陵使这一职官存在。

[20][韩]赵胤宰:《长江中下游汉六朝砖墓的建筑构造与技术研究》,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1]满城中山国靖王刘胜的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物的铭文上未刻有当时年号,仅记有分封王的在位期间。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 1980年。
- [2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桂阳王萧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第12期。
-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
- [24]邵磊:《六朝草书砖铭概说》,收入《冶山存稿》,凤凰出版社2004年。
- [25]草书刻铭中已被确认的有“独孤良良”砖及“城关”砖。前者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砖的年代为东晋十六国时期或其后。后者系1982年出土于句容县南朝刘宋元嘉十六年墓,现藏于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
- [26]周一良:《关于百济与中国南朝关系的几点考察》,《百济研究丛书》1993年第3辑。
- [27][韩]李成珪:《韩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与汉字受容》,《韩国古代史研究》2003年第32辑。
- [28]朱仁夫:《对中国书法史的两点思考》,《中国古代书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29][韩]任昌淳:《百济的汉文文化》,《百济研究》1983年第14辑。
- [30]丛文俊:《〈好太王碑〉书法及其相关问题略论》,《中国书法》2003年第9期。
- [31]百济与梁朝的交流及往来大多已通过文献及考古资料得到确认。此外,相关的论文及研究也已说明尽管上层文化的改变程度有所不同,但一定是实现了这样的改变。
- [32]王靖宪:《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艺术·魏晋南北朝》,文物出版社1998年。
- [33]《梁书》卷五四《百济传》:“中大通六年、大通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
- [34]当时轻部慈恩对百济相关遗迹及遗物的研究成果一部分得到承认,但其非学术性的研究意识及利用日军强占期的时代特殊性肆意进行调查的方式成为了受批判的对象。参见[韩]尹龙赫:《轻部慈恩的公州百济文化研究》,《百济研究》2005年第34辑。

## Interpretation on bricks inscriptions of Songsanri Tomb 6, Gongju, Korea

Cho Yunja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je University, Pusan, Korea)

Abstract: There was a record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Baekje and Liang in Southern Dynasties carved on the brick excavated in Songsanri Tomb 6, Gongju, Korea. Interpretation attached to fonts and contents of inscription deucedl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calligraphy and search of related materials, the inscriptions can be interpreted as “Liang Xuan Yi Wei Shi Yi (梁宣以为师矣)”, thus the nationality and social status of person in charge of constructing tombs can be speculated.

Key words: Songsanri Tomb 6; in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本文终校:石磊)

## 启 事

为了答谢广大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本刊的支持与厚爱,方便读者查阅本刊历年发表文章及最新动态、关注热点等,本刊分别在南京博物院官网、知网及新浪网等网站开通《东南文化》网站与微博,期待与广大作者、读者加强交流、增进友谊。

相关网站与微博近期正在建设、完善中。敬请关注、参与。

南京博物院官网东南文化网址 <http://dnwh.njmuseum.com>

知网东南文化网址 <http://dnwh.chinajournal.net.cn>

新浪微博东南文化地址 <http://weibo.com/2005055595> 东南文化

网站管理员:张平凤

《东南文化》编辑部